

哲学转向视野中的考古学

□ 杨国柱

科学哲学发展经历了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历史主义迈向了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纷繁争论的局面,走向了语境的圆融。哲学的每个发展阶段对考古学的发展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分别出现了考古学中以经验主义的归纳法为主要手段的传统考古学;以人类学前提为演绎基础、依靠现代科技的实证主义为手段的新考古学;强调遗存的不同的解读方法,摒弃单一化的理解方式,以解释学为基础的后过程考古学,从而考古学逐步实现了从描述性走向理解性的发展。

一、经验主义的归纳法与传统考古学

1620年英国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工具论》问世开创了近代西方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他改变了亚里士多德的简单枚举几个正面事实就得出结论的归纳方法。他认为“科学与技术的发现和证明有用的归纳法,必须要用适当的拒绝和排斥法来分析自然,在得到足够数目的否定例证后,再根据肯定的例证做出结论。”以多元对象归纳一般知识,强化了与归纳推理方法相联系的观察、实验和分析方法,这些都成为了从自然界发现真理的重要手段。科学研究方法转变的趋势直接影响了19世纪欧洲从寻访古迹古物发展而来的考古学。

从当时以文化历史重建为目标的传统考古学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们有意无意的运用了经验主义的方法论。以古物分类为基础,依据进化论理论,丹麦学者C·J·Thomsen归纳出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考古学“三期说”,为研究过去并提出理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框架。后来引发的“类型学”在发掘的基础上定义文化类型,用类比的方法来构建文化序列。

传统考古学价值目标的取向决定了其研究方法上的经验论。在传统考古学中人们把类型学和地层学作为考古学中的两大支柱,将对材料的忠实记录和客观描述作为研究的终极目标。为了重建文化史,注重对材料的罗列,采用基于经验和常识性推断的归纳法,在分析文化单元方面用迁移、传播来进行说明,诉诸于外来因素,而缺失对文化单元的内部分析。而将对材料的释读看作是次要的任务或由历史学家来完成工作,对文化的变化上用经典力学中的迁移传播论,也可以说是受到机械决定论的影响,把文化单元几乎等同于力学中的波函数,走进了“唯物是从”的象牙塔^[1]。

随着考古学发现的增加,考古学家开始对遗存的年代和分布开始关注,并且开始脱离进化论的单线的思维方式,转向考虑材料的历史关系,用类型学的方法来建立年代的谱系,利用器物的相似性来跨空间讨论它们的亲疏关系,其中蒙特柳斯用类型学的方法对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考古发现进行了分期。柴尔德《欧洲文明之黎明》一书中采用文化概念结合蒙特柳斯的类型学以一种文化的复杂镶嵌模式重建欧洲的史前史,被称作文化历史考古学方法的范例,丹尼尔称为“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

二、分析哲学与新考古学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学文化谱系和编年工作在各个地区的建立,考古学界已经不再满足于建立在地层学和类型学之上的传统的文化史的研究,对以传播、迁徙等概念解释文化变迁的模式提出质疑。开始注重用内部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如把人类学的文化功能观、文化生态学和经济学等理论引入考古学。终于在60年代初形成了“新考古

学”。20世纪60年代,随着放射性碳素方法的进展,考古学传统的目的可以很快达到,以路易斯·宾福德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兴起的年轻考古学家们对以器物为中心的传统考古学进行了反思,将文化生态学、功能观、缀合法和系统论引入考古学。新考古学的终极目标不是要了解历史,而是要像民族学一样来重建人类的过去,并总结人类社会演变的规律或通则。为了完成这些目标,新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从历史的传统转向了科学。

新考古学产生的背景是自然科学手段尤其是测年技术的发展,把考古工作从以前的文化编年史的研究中解放出来,可以关注和探索更为重要的学术问题;其次,欧美考古学家对传统考古学研究方法的批评与改进,奠定了考古学变革的理论基础。其中,文化功能主义和文化生态学是两种主要理论。新考古学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用系统论方法来解释文化发展过程。因此也被称为“过程考古学”。新考古学打破旧有的清规戒律,他们借助当代科学哲学——“即结论若被视为无误,它必须接受验证”的思想,试图去解释,而不是单纯的描述,考古学方法从此由经验主义向实证主义过渡。

宾福德是新考古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1962年发表的题为《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美国的考古学就是人类学,而人类学的目的是“说明和阐释整个时空内的人类生存之物质及文化上的异同。”^[3]他用人类学的一些基本原则作为演绎的前提基础,引用生物学上的某种一般原则和其他学科的术语,提出一些考古学上的问题,再用考古资料来验证这些问题,新考古学主要解释过去事情发生的原因,而不是描述过去发生了什么。传统考古学家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范围比较大的地区,如墨西哥玛雅人遗址奇琴伊察、古埃及、巴比伦、希腊的文明古迹等,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就。与关注著名遗址不同的是,新考古学家则把主要注意力转向知名度较小、保存稍差的地区,把遗址的群体按照功能主义的观点进行分类,如公墓、城堡、住房、堆积等,并且注意当时当地的自然环境。这也就是后来提出的聚落考古学的一些内容,包括文化生态学、系统理论和空间分析三部分,注重聚落的整体研究,并通过対居民社会的研究去看文化的变迁。传统的以器物为研究对象转变为以遗址为研究对象。这时聚落考古的代表性研究有欧洲克拉克的《史前聚落形态研究》(1953)和美国戈登·利 G

Wiley) 的《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研究》(1953)。自此,考古学的价值取向已发生了变化,它应用系统论的思想,采用聚落考古的手段,注重对文化过程的解释,走出了传统的文化序列的静态过程,以文化历史重建为主要目标,不再停留在经验的层次上,而与逻辑实证主义接轨。新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从历史的传统转向了科学。

必须认识到,新考古学家在积极运用分析哲学的同时,也出现了“科学主义”或“功能主义”的倾向,“过程考古学”在其发展的前十年,重点确实是在功能和生态的解释上^[3]。同时它仍然站在进化论的立场上,只不过是借助了科学手段来解释他们认为的“真实的过去”^[4]。

三、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考古学

库恩是后现代主义的“始作俑者”,他的理论对相对主义卷土重来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具有直接的导向作用,可以说,库恩将后现代主义引入科学乃至整个文化世界中。这股强风也刮到考古学中。

20世纪中期,伴随着批判理性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衰落,一个新的哲学派别——历史主义学派开始流行。它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知识作静态的逻辑分析的思想,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批判理性主义研究科学发展动态模式的合理思想,以及奎因的逻辑实用主义的整体主义思想。并把它们与科学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从而发展成为一个较能适应当时科学发展新形势的新的科学哲学流派,其中库恩(Thomas Sammal Kuhn, 1922—1996)就是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库恩深受波普哲学思想的影响,反对归纳主义,关注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他说:“归纳主义把科学的发展看成是一点一滴的进步或一件一件增加的连续不断的积累过程”,从而“把科学史看成是一堆轶事或年表”,“它会把我们引入迷途”。

库恩所主张的科学发展模式是以一个个内部自洽的范式为发展单位,以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范式转换为发展形式,范式与范式之间没有规律性的联系。在范式内部来说,一个范式的确立和发生作用,是相似关系的作用,同样不是以规律的形式来形成的。

库恩的历史主义的范式,对科学进步的模式进行了人文主义化,科学不再是真理的象征,科学的发展其实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建构,为一个科学共同体所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可以说科学的话语霸权受到

了人们的质疑,在科学主义之后兴起的是后现代主义,也就是后科学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上世纪60年代左右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泛文化思潮,它涉及艺术、文学、美学、语言、历史、政治、伦理、社会学、哲学等观念形态的诸多领域。它以西方发达国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由国家垄断走向国际间的跨国垄断阶段,即晚期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为背景,以逆向思维分析方法批判、否定、超越近现代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为基本特征,是当代西方社会经济、政治的观念反映,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当今世界的诸多矛盾与冲突。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理论基础。它是伴随着现象学、分析哲学的式微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的衰落,以后结构主义和新解释学的兴起为标志而登上当代思想舞台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起初是以彻底否定现代哲学的面目出现的,人们称其为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以后在回应激进后现代主义哲学过程中,又逐渐产生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

以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后起的一个重要流派,对现代文化也是采取基本否定态度,不过它的否定不是激进性的彻底摧毁、全盘根除,而是强调通过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实现对现代性的超越,建立新的世界观,以适应西方现代社会的需要。

后现代主义其实是科学主义的人文转向,后现代主义对各个学科的发展都有深远的意义。哈德《解读过去》就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从批判新考古学的三个问题开始,这也是新考古学其在追求科学性方面产生的必然问题,然后对“文化”、“个体能动”、“个体行为”与“文化结构”、“结构”、“历史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以此树立了自己的研究方法:结构的比较(四维度)加上个人理论方法,因此结论是一种“趋向于一种批判的解释学”。

因此,考古学的研究不应刻意的追求统一性,要注意到各个时代的流变性,要走向一种理性的考古学。特里格指出:“无论是考古记录还是物质遗存,如果不与人类行为相联系,就根本无法了解他们,这也是考古学唯一可以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沟通的方面。”^[9]因此考古遗存必须进行解释,未经解读的遗存并不能成为史料。

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早期的新考古

学已在某些方面受到批评。Bruce Trigger 首先在他的《时间与传统》一书中指出,新考古学所强调的探求规律性解释法则的那一套太过勉强。考古学家们认为考古学还是和历史联系最为紧密。鉴于各种批评,英国和美国的一些考古学者提出了一套新方法,用以克服他们所认为的新考古学的局限性,这便是20世纪90年代的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目前,后过程主义的争辩大体已经结束,留下了一系列有意义的理论方法,在总体上形成了21世纪初的阐释考古学^[10]。

后过程主义考古学认为,理解应是考古学研究的目的。新考古学发展时当时的哲学取向是理性主义,寻找的是自然与社会的规律,或者说是为自然和社会创造规律。文德尔班认为:“自然研究与历史的分别,首先开始于利用事实来构成知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前者追求的是规律,后者追求的是形态。在自然研究中,思维是从确认特殊关系进而掌握一般关系;在历史中,思维则始终是对特殊事物进行亲切的摹写。”斯本格勒也同意这种看法,“在历史的世界里,没有所谓的理想、没有所谓的真理,有的只是事实。也没有什么道理、诚实、平等、最终目标之类,有的只是事实”。考古作为探求古人的文化过程,首先应是对考古遗存的注重,遗存本身表现的人的活动所传达的一系列意义,理解这些意义不能脱离当时的文化背景。历史主义对于达成理解也提出了相应的方法:由德国思想家赫尔德主张的“移情原则”。要想通过遗存理解古代人类历史和文化,只有采用设身处地的方式,同化于研究对象,思索其行动,体验其经历,这样才能得到其真谛。

后过程考古学受到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和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结构主义影响,强调人类的行为是受信念和符号概念控制的;用人文和历史主义的观点,霍德认为,物质文化是“意念的体现”,它们都源自历史上某些个人的思想和作为,应该把考古遗存放入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理解,同时并不排斥人的意识的能动作用,不再象新考古学中追求客观性,认识到社会的变化并非纯自在的过程,它既受到以往历史因素的制约,又轻受到其独特文化背景的影响。

四、结 语

考古学的发展从汤姆森的三期论、柴尔德20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历史考古学到60年代的新考古学

革命及至 80 年代的后过程考古学,考古学逐步从描述性走向了演绎的方法论。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日益严谨,这也是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要求尊重科学的呼声给我们造成一定的压力;另一方面,我们想说服我们生产的知识的消费者,这些研究对他们有一定的启发。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我们之所以研究它,就必然会关注它对当代社会有什么影响,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我们的学科并不只是收集人类传统问题的各种方法,而且要进一步探索人类的生活环境、新的知识体系,创造新的条件以彻底检验我们观察世界的思维方式。^[7]考古学中强烈的编史倾向,使许多学者将原始材料当作史料来处理,而未意识到未经释读的材料并非是史料^[8]。因此后过程主义的考古学开始强调考古遗存的象征意义,承认理解模式的多元性和可选择性,要求在解释者与被解释的对象的关系中理解文化遗产的意义^[9]。

克拉克说,考古学的发展是与其纯洁性的丧失为代价的。我们从考古学的发展中可以看出,考古学最初的简单描述,到新考古学的理解模式的单一化,最后发展到了后过程考古学的理解的多元化。从开始的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发展到广泛借助人类学,生物学,自然科学和科学哲学的方法。考古学和其它学科的融合,为考古学的重大进展奠定了基础。^[10]劳斯曾说过,科学哲学的未来就是解释学。考古学发展到后过程考古学,一方面是新考古学在发展中遇到了自身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受到哲学发展的影响。所以,随着考古学的继续发展,在后过

程考古学之后一定还会有更能适应未来需要,更能体现最新哲学思想的新方法论兴起。

参考文献

- [1] 陈淳《考古学的新与旧》,《文物季刊》1999 年第 1 期 16 页。
- [4] 王纪潮《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东南文化》2003 年第 11 期第 8 页,第 9 页。
- [2] 梁丰实等《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文物出版社,第 164 页。
- [3] [6] 科林·伦福儒《考古学》,文物出版社,第 39 页,第 487 页。
- [5] Trigger, B.C. 1986. Prospects for a world archaeology. *World Archaeology*. 18(1): 1- 20.
- [7] 梯姆·莫瑞著,张良仁、陈星灿译《从悉尼到萨拉热窝》,《考古与文物》2002 年第 6 期第 83 页。
- [8] 陈淳《考古学方法的思考与借鉴》,《考古学》第 42 页。
- [9] 赵敦华《考古哲学在西方发展以及在中国的任务》,《求是学刊》2003 年第 9 期第 18 页。
- [10] 张海《后现代主义考古学的形成》,《东南文化》2003 年第 11 期。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文物信息中心)

(上接 40 页)

只能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作画,思想是受限制的。而《女史箴图卷》作为一个文人画家的作品却可以比较自由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了人的思想情操,这就有可能把他对于社会现实的看法,通过绘画的形式表达出来。

总之,观看司马金龙墓木版漆画首先要以其“前面”研究其艺术特征,深入其艺术世界,找到蛛丝马迹,才能打开其“后面”,触摸到历史。从研究漆面绘画的“近似”,“相似”,找到《女史箴图卷》,找到

《女史箴》,找到“列女传”,了解到了汉、魏、两晋以来的政治局面及其社会思想和道德内容斗争的变化情况。起码说明了这块小小的屏风漆画绝不仅仅是对“女德”的说教,而是有其政治寄托的。它反映了作者幻想着有一个君贤民安、秩序稳定的和谐社会,和对上层社会腐朽生活的某种揭露和针砭。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博物院)